

不要问我们去哪里

邵忠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我们来自哪，我们是谁，我们去向哪里？），关于类似的命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已故著名当代思想家、学者杨小凯在“文革”后期所发表的一篇轰动全国，充满诗人悲情，以及对民主自由憧憬和对民族前景忧虑的缴文——《中国去往何处》，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流亡海外。然而在今天，类似的思考早已被埋葬在名誉、地位、权力与金钱的泥土下，显得有些不和适宜，即便是在艺术界，大家思考最多的恐怕是最近的画价谁最高，难怪胡润也能与时俱进，评选出中国艺术家财富 100 榜。

信念的幻灭、理想的落空、财富的乏味、人情的冷漠全部交织在一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然而，我们内心深处却无法容忍一个势利的社会，以权力和财富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众对艺术的认识只停留在价格上，艺术家则以谁的拍卖价最高为荣，艺术商业模范成了当今这个时代的宠儿。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现在哪里？何去何从？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放到一个中国社会现实的前后文关系里来思考。回顾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文革”后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艺术家为了摆脱艺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说教功能，移植了西方的启蒙、反思和救赎的观念，这种它山之石为剥离政治重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也由于其高度宣扬个体意识而难免陷入乌托邦的境地。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当代艺术的主题也随即转入了艺术与商品的关系。如同中国的其它所有经济领域一样，滚烫的资本介入造成了艺术市场的发烧，艺术市场与当代艺术的概念混淆一体，艺术市场更是扮起了当代艺术评分者的角色。进入新千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广泛推行而来的是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于是观中国当代艺术，伴随商品化加剧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当下任务都十分艰巨，一为如何褪去泡沫，寻回艺术的理想性、独立性和思考力，二为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融合和博弈中找到与中国文化和当代现实产生真实关系的语言体系。

回想西方现代艺术史，保罗·高更创作于 1897 年的一幅后印象派风格画作曾经围绕“我们在哪里”这一主题，那是一幅充满宗教寓言意味的作品，表现了画家对现代社会的空无所怀有的质疑。

无独有偶，2006 年 4 月，威尼斯的翠拉希宫（Palazzo Grassi）重新向公众开放，开幕展名为“Where are we going?”（我们去向哪里？），展出的是其年世界艺术权力榜单上排

名第一的收藏家，亦是古驰集团主席 Francois Pinault 的私人收藏作品。“Where are we going?” 这个问句随着展览海报布满了威尼斯这个行色匆匆的旅游城市的大街小巷，发人深思。

今天，在阔别六年重返京城之时，翁菱女士带着同样主题的首展而来，不能不让人思索她想要表达的深意，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她对当今国内当代艺术界繁荣与虚妄相交织现状的严肃发问。翁菱女士是最早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国际艺术市场的策展人之一，也是面对目前国内艺术市场暴热现象最为冷静的艺术界人士。这几年她策划了很多有活力、有思考力的艺术展览，我一直在关注，虽然从命题到表现，每个展览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代中国现实认真的关注、思考和呈现。她对当代艺术的释意和评判标准简单明了，我十分赞同，“就是用任何可能的媒材来思考和对话与这个年代的人和有关的一切现实及非现实的东西”，“如果某个艺术展讨论了你正在经历和思考，对你来说这就是好的展览、好的艺术。”

“我们在哪里？”这个古老的命题在今天无疑仍然深沉、有力，并且可以确信，这样的发问也绝非仅仅指向当代艺术领域。在众人似乎都在忙于奔走未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最需要的是能停下来，反躬自问“我们在哪里”。显然，翁菱女士的这次展览已经开了一个头，我们也期待着在开放与和谐社会的时代，这个话题能在理性的声音中被更广、更深地谈论下去。